

夏
东
元
著

鄭觀應傳

顧廷龍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郑 观 应 傳

夏 东 元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华东师大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20 千字

1981 年 8 月第一版 1981 年 8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本

统一书号: 11135·003 定价: 1.00 元

序

夏东元同志的《郑观应传》已完稿，我先读为快之心切，索取手稿读之，觉得无论是对郑观应的评价和洋务运动史的识见视野，或者是书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和严谨的学风，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欣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此稿排印问世，写几点读后感，算是我乐而为之的序言。

《郑观应传》是夏东元同志多年研究的成果，全书内容，是他研究洋务运动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远远超越了洋务运动史的范围。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我们繁荣学术的关键。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认识和反映这个客观规律，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作为今天乃至明天的借鉴。这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掌握丰富史料，从史料的实际出发进行研究。夏东元同志写作《郑观应传》时，确是力图这样做的。这本传记，为了尽可能反映郑观应的全貌，作者除阅读已刊行的资料外，还翻阅了大量未刊的档案材料，其中单是郑观应自己写的和其他人写的有关的信函就达千余件之多。郑观应虽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实业经营家，但对他有比较全面了解的人并不多。就其生卒年来说，在过去，生年就有从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四年五种说法，卒年也有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四种说法。究竟生于何时，作者用了不少工夫，找到了郑的三份生辰八字，作了定论。关于卒年，作者在一九七九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的《郑观应思想发展论》中，定为一九二三年死于澳门，为慎重起见注明“暂定待考”。兹后经过调查，

定为一九二二年五月死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内，一九二三年迁葬于澳门前山。所谓“一九二三年死于澳门”，是把“迁葬”的时间地点误认为是去世的时间和地点。这样，郑的卒年也就清楚了。

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要阐明历史规律，如果不认真研究经济、经济史，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是难以认识和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郑观应一生的社会实践是多方面的，其中更多的是企业经营活动，在经济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合乎科学的经济理论和经营方法。本书对郑观应的经济活动、经济思想的叙述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是应该的。其中我想提一下的：

首先是郑观应与洋商进行“商战”和“有工以翼商”的思想。郑观应自己说：“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确实，“与洋商争利”的“商战”，是他平生一大志愿。这里所谓“商战”，并不是专指商业，而更重要的是指发展工业。郑观应认识到，要进行商战和操商战的胜算，没有强大的工业作后盾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郑观应所说的“有工以翼商”。郑观应绝不是只注重流通领域的“重商主义者”，而是非常强调生产过程的重要性的。此其一。

其二是“全以商贾之道行之，决不拘以官场体统”。要与洋商在市场上角胜，必须拥有价廉物美的商品。郑观应懂得，要做到这一点，非在生产中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可。这就必须“以商贾之道”办企业。所谓“商贾之道”，对资本主义说，表现虽然很多，但归根到底，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之道，就是加速资本周转率使之尽可能多的发挥赚取利润的作用。这对资本持有者本来不成为问题，但当时清政府搞的“官督商办”往往违反“商贾之道”，以做官之道管理企业，即所谓“拘以官场体统”，这就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削

弱了竞争能力。要求以“商贾之道”办企业，实际上是要求在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排除夹杂着的封建关系。

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很多，起决定作用的要靠先进的技术。所以郑观应很强调学习西学和引进机器设备，并主张设专厂制造机器。他的“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的论述，是进行“商战”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规律性的见解。

“传”中对上述这些问题，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有规律可寻的，一个历史人物也不例外。在我看，郑观应一生的主导思想是爱国主义。从这点出发，他要求抵御外侮，反对侵略；要达到反对侵略的目的，必须富强，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他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发觉阻挠资本主义发展的，是清封建专制制度，于是始而托古改制，提出实行与“三代法度相符”的议政制，继而激烈的要求实行英日等国的君主立宪的议院制。这样，郑观应就形成用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保证工商业发展以致富强，从而达到抵制侵略和维护国家民族独立目的的一套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郑观应是怎样从爱国观点出发形成这一思想体系的，这个思想体系的发展过程如何，必须弄清郑观应代表作品的写作和发表过程，才能更好的说明这些问题。《盛世危言》是郑观应的代表作，但据目前所知，此书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是版本较多的一种，从它的前身《救时揭要》、《易言》到一九〇〇年《盛世危言》八卷本，究竟有多少版本，那些是郑观应手定的能代表他的思想发展的？作者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到现在为止，已收集和看过二十余种（见书末《〈盛世危言〉版本简表》）。虽不能说已经收全，但通过这些版本的比较鉴别，一些手定的能代表郑观应思想发展的

版本，基本上可以确定，因而也就可能比较正确地阐述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从而可以抓住他的思想脉络和线索了。

这条脉络和线索在“传”中是这样反映的：郑观应从爱国救国出发，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前期，基本上是感性认识阶段，即主要是对外国侵略者和社会腐朽现象的愤怒揭露与正义感式的批判；七十年代下半期到八十年代初，则提高到理性的认识，透过现象对社会本质的问题有所认识，并初步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以致富强，多少改变一些专制制度实行议政制以通上下之情等。八十年代后半期到九十年代，随着他的社会实践不断丰富，他的维新思想成熟了。他不但在抵御外侮方面，在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思想设计出一整套办法，而且在内政改革方面，除强烈要求实行君主立宪议会制度外，也设想出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内政改革方案。这些，郑观应大都写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此书从一八九四年初刊的五卷本到一九〇〇年刊行的八卷本，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在当时可算是讲维新变法最完整的一部书。中国近代教育家、当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就说过：《盛世危言》“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蔡元培是一八九六年讲这话的，无法确定他看到的是初刊五卷本还是增订本，但至少可以肯定他未看到八卷本。增订的八卷本就不是“条目略具”，而是很完整了。在一八九五年以后那几年，社会上曾一度出现过《盛世危言》热，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郑观应不愧为进步的思想家。

然而，二十世纪初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并逐渐蓬勃发展，郑观应在经济主张上虽仍有积极意义，可是，由于他坚持君主立宪，政治上落后了。但郑观应的主导思想

是爱国主义，是一心要把中国“登于富强之域”，并且在救国御侮、发展科学技术以尽快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厌恶专制实行民主这些本质问题上，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不同程度的一致性，[※]所以当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崩溃的条件下，他没有明显的反对共和的言论和行动。在此后袁世凯倒行逆施搞专制独裁和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下，郑观应且有某些赞同共和的表示，这是合乎郑观应的思想发展逻辑的。

夏东元同志的这本《郑观应传》，不仅资料丰富，且多新意，确是当前洋务运动史和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值得珍视的一本新书。

夏东元同志研究洋务运动史多年，他在写这部传记前，已编定了一部《郑观应集》，近年又在着手撰写《洋务运动史》专著。我为《郑观应传》的完稿问世而道贺，并祝愿他编著的《郑观应集》和《洋务运动史》都能早日出版，完成他多年的宏愿。

吴 泽 一九八一年五一节序于华东师大

前 言

郑观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二年）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

郑观应的思想核心可以概括为“富强救国”四个字。他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以拯救民族于危亡。为了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他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特别是经营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郑观应对自己的思想曾作过如下表述：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这几句话虽是郑观应于一九〇九年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说的，却是他五十年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他大半生大量著述的思想结晶。在这里，郑观应把“攘外”作为救国的头等任务，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体系，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为它反映了客观形势的需要。

郑观应出生于一八四二年《江宁条约》签订之前一个月，十七岁那年（一八五八年）走上社会就业时，正是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兹后几十年，他经历了庚申之变、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等大的屈辱事件，目睹

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和中华民族濒临被瓜分的惨祸。处于这种形势面前，郑观应把“攘外”作为救国的头等任务，是他爱国御侮热情的表现。

“攘外”靠商战，还是靠兵战？郑观应认为，兵战固然不可忽视，但它是“末”，商战才是“本”。即他所说的“商战重于兵战”，绝不能“舍本而求末”。他从商战这个基点出发，提出了建立工业体系以保证商战胜利的见解。

要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商战，必须要有强大的工业作为后盾，即所谓“有工以翼商”。因为商战必须要有丰富而又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只有发展近代工业才能做到，否则商战就是一句空话。要使商品能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先进的机器技术的使用。郑观应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很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进先进的机械装备。为了不受外国人挟制，单靠购买和引进机器技术是不行的，必须自己能够制造这些机器。江南制造局等军用工厂，主要是造军需品，而且效率很差，因此，郑观应早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提出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

单靠在工厂里使用先进的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不一定能使商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和到达消费者手中。郑观应明确认识到，必须要有新式的交通运输和电讯设备，才能降低运费和了解商情。所以他十分重视发展近代航运业、铁路、电报等事业，并对发展这些行业的意义和办法，有比较合乎科学的说明。为了同一目的，郑观应又建议废厘金，减税收，享受与洋货同等的轻税免税的权利。这还不够，要发展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必须具备动力、原材料等条件。于是郑观应又提出大力发展煤炭、金属的采掘和冶炼等工业。

为了使工商业顺利发展，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他主张自己创办银行，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资本加快周转，他的“银行为百业总枢”的认识是深刻的。

可见，郑观应为了操商战的胜算，对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都有周密的考虑和措施。但要把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办好，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否则“借才异域”，不仅要受人挟制，且工薪很高，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所以郑观应不断地大声疾呼，把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由此可见，郑观应关于商战的思想体系是完整的。他认为，只有发展近代工商业并在同外国资本主义商战中获胜，才能达到富的目的，只有富，才能真正的强。不但在经济力量上说是如此，而且从军事技术上说也是如此；整个工业水平提高了，军事技术也才能更高。请读他下面的一段话：

“我国亟宜筹款，广开艺院，教育人才，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庶制造日精，器物日备。以之通商，则四海之利权运之掌上也；以之用兵，则三军之器械取诸宫中也。此国富民强之左券也。”

这些话说明了：军事技术的提高，取决于整个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的提高。郑观应认为，不注重商战而单搞兵战，是绝对不能强的，即使强也是表面的。他说：“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

郑观应是不是实业救国论者呢？不是。他是很注意政治制度的改革的。他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实践尤其是经营工商业

的实践，深切地体会到，工商业的发展，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在这个制度下的政权，必须是对新式工商业支持、能代表商民利益的。因此，它必须是有商民代表参加的有一定民主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郑观应认为，如果政治不改革，仍然保持封建专制政权，就一定会扼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工商业受到摧残。因而他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提出实行君民共主的议政制，也即稍后明确提出的君主立宪制度。这个制度是承认君权前提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当时如能实行，不失为一种比较适应于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制度。这里表明，郑观应已知道政治对于经济的阻碍和促进的作用。他说：“宪法乃国家之基础，……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实业万难兴盛。”必须象西方国家一样，“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郑观应非常强调要有“治人”，以制定适合于工商业发展的“治法”。有了“治法”，还必须有执行“治法”的人。这就是说，这个“治人”，既是“治法”的制定者，又是“治法”的执行人。他说：“有治人而后有治法，有治法必须有治人。二者不可须臾离也。”这里所讲的“治人”，当然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制“法”和执“法”，都必须具有新的资产阶级知识的人。才可能办好。如果一脑袋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怎么可能制定出资产阶级的“治法”！又怎么可能贯彻执行资产阶级的“治法”！欲新“治法”，先新“治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据上所述，郑观应是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楫杆的。这两根楫杆实际上就是民主与科学。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两面旗帜。它是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在摸索富强道路

上的正面和反面经验总结。郑观应则是在这正、反经验中亲历其境者。在他的脑子里已孕育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胚胎。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魏源已开始有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萌芽了。他提倡“师夷长技”创立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他说中国应该象西方国家一样，用科学技术“夺造化，通神明”，“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筹海篇三》）。应该认为，这是企图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改造中国的开端。魏源，在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他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是憧憬的。他很称赞美国的大总统“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的公举制度；对于美国“议事诉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见《海国图志》卷五九）的制度，也表示羡慕。这实际是对民主制度的肯定，尽管他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怎么回事。

冯桂芬对西学的论述要比魏源具体得多，他说：西学中的宗教经典，“皆猥鄙不足道”，而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以及舆地、农业器械、制造技艺等学，“皆得格致之理，……多中人所不及”，应该向他们学习。并有信心地说：

“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至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他虽没有正面地发表议论，但他所说“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就在实际上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的优点同中国的专制制度的缺陷联系起来作比较。这是冯桂芬超过魏源的地方。

洪仁环比魏源、冯桂芬要高出一筹，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技艺”、“邦法”都很重视，并且试图在中国实行。他于一八五九年所作《资政新篇》，在这两个问题上议论较多。由于洪仁环对中国社会情况了解得不那么清楚，对这两个问题的思想也不那么明确，论述是含糊的，对思想界的影响不大。

可见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民主与科学问题上还只有朦胧的启蒙的认识素材，谈不到在实践上的经验教训。六、七十年代之后却不同了，它提到了实践的日程，因而思想家可以从实践中来总结了。一八六〇年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变革的思潮。思潮总的倾向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即使清统治集团内部原来很顽固的人，也知道不变不足以拯救清朝的统治。洋务官僚买办乃至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虽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但在一段时间里，这个总倾向是一致的。洋务运动的兴起，在某一角度代表了这种思潮的“总倾向”。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矛盾暴露了，其间主要一个矛盾是运用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矛盾。有些有维新思想的人看出，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发展工业，还是皮毛的因袭，还必须在政治制度上加以变革以有利于科技与实业的发展。政治制度变到什么程度，在当时，最大限度是实行有一定民主的君主立宪制。郑观应是较早提出在中国实行这种政治改革的思想家。

郑观应于一八六〇年任上海宝顺洋行买办后，即在跟傅兰雅学英文的同时“究心政治、实业之学”。这就是说，他既注意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又注意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何者适合于中国。在六十年代初，大家只注重在科学技术上向西方学习，而郑观应却能“究心政治、实业”两个方面，这确乎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他能较早地对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三种制度进行比较，而得出了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最适合于中国的结论，并把这个观点写在一八八〇年刊行的《易言》中。郑观应在《易言》中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艺，同时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民主议政制度。

但那时，郑观应还没有把民主制度与科学技术有机地联

系在一起加以论述，他作到这一步是在一八八四年。他在南洋一带游历途中的“日记”（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九日）中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南游日记》原稿影印本页六七）这是郑观应把民主与科学二者的关系，第一次提高到体用关系上来阐述。在这里他指出中国“遗其体效其用”，也即学习其科学技术而丢掉它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做法是不对的。但他还只是认为“遗其体效其用”不过是“难臻富强”，似乎是说没有民主制也不是绝对不能达到富强的目的。到一八九二年所写《盛世危言自序》，这个模糊观点就变得明确了，他借着张树声的话说，“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必将步趋人后，永远不能迎头赶上，即使是“铁舰成行，铁路四达”，工业很发达了，也是不足恃的。

讲得多么清楚！这里表明，民主制度与科学技术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民主，是不可能达到富强的。郑观应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观察，坚信民主制度是发展科学技术和近代工商业的保证，专制制度则是扼杀科学技术发展的恶魔，必须加以改革。问题在于，他所说的政治改良，只到君主立宪为止，当这种要求不能达到目的时，他还是执迷不悟而坚守不变，这就无怪他的“富强救国”的良好愿望终其身不能实现。但郑观应毕竟揭开了民主与科学的奥秘，是值得我们后来人敬仰的。

不可否认，象所有历史上的先进人物都有他们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一样，郑观应也有他的局限性。总的说来，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不仅已认识到中华民族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和封建主义束缚的矛盾、民主和专制的矛盾，而且提出解决这些矛盾的方策。这些方策，在其提出及以后的一段时间，曾经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需要和反映时代要求的，因而是先进的。

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郑观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活动一如既往，并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他的政治思想却不能跟随时代前进了，这是什么原因？根本地说，是由于他始终站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立场，并坚信君主立宪可以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故而不能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跃进到革命。

正由于郑观应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叶的近十年间，他的经济主张上虽仍有积极意义，但他的政治上的言行，正好与清政府所搞的假维新、伪立宪相呼应，与正在兴起和发展民主革命背道而驰。在这时，时代并没有给予他什么局限，这只能是他与那时立宪派相一致的阶级局限性了。

然而，由于郑观应坚持改良主义主张，使他在救国、发展实业和要求民主厌恶专制这些本质问题上丝毫没有后退。因而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清王朝这个大厦栋折榱崩，共和国的大厦初步搭起了架子，君主立宪的前提不存在了，而共和国的形式却在某些方面，例如反对专制实行民主方面，与郑观应长期所憧憬的有程度不同的一致之处，因而规定他不会有什么坚决反对共和的言论和行动。

正因如此，所以当袁世凯窃夺了政权，扛着民主共和的招牌，倒行逆施地逐步走向专制独裁，并黄袍加身做皇帝的时候，郑观应起来反对了。他认为这样下去，中国非但不能富强，且有亡国的危险。这时，他对于共和非但不反对，且有赞同的表示。这是合乎他的思想逻辑的。从郑观应一贯的

富强救国和君主立宪主张看：改良与革命相比较，他倾向于改良，不赞成革命；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相比较，他倾向于君主立宪，不赞成共和立宪；但在清王朝灭亡民国成立之后的条件下共和立宪与专制独裁相比较，他毫不犹豫地反对专制独裁，而倾向于民主共和制。所以，他在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下，说出了“共和非不能富强”似乎赞同民主共和的话。并指出，实行共和制，必须要有内圣外王如轩辕皇帝那样的“治人”。言下之意，共和制还是可取的，问题在于缺乏实行共和制的人。说共和制是要人来实现的，不是没有道理；但要真正实现名符其实的共和制，必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才能做到，这一点他终其身也没有搞清楚。至于怎样才能培养出执行共和制的“治人”，他的见解又似乎后退了，他居然说是要由什么“修真院”来培养，幻想修道以救世。这就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有心救世而又找寻不到救世的好办法的逻辑！

本书所用未刊资料，系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所提供，没有大量的有关郑观应的未刊资料，《郑观应传》是写不成功的。我在这里谨致谢忱。

本书在处理稿件和出版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林远同志提了不少宝贵意见，使本书得以早日与读者见面。并致谢意。